



主编 韩忠良 祝 勇

布老虎 散文

【2005】
秋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用破一生心·王充闾 / 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孟
翔 / 走进打击乐·苍耳 / 读莫扎特与忆乡村·耿
宗玉 / 我们的词·蒋蓝 / 人之初：成长蒙太奇·谢



主编 韩忠良 祝 勇

布老虎 散文

【2005】
秋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祝 勇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老虎散文·2005·秋之卷/韩忠良, 祝勇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9

ISBN 7-5313-2906-9

I. 布… II. ①韩… ②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237 号

布老虎散文·2005·秋之卷

责任编辑 施凌飞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守望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shilingfei77@163.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28mm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5.625 插页 2

印数 1—12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目录

contents

新散文家 在荒原上歌唱

刘 春 / 1

特别纪念 不可思议的旅程

荣 棣 / 8

名家专辑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 / 68

碗花糕

王充闾 / 81

土囊吟

王充闾 / 89

一夜芳邻

王充闾 / 104

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

孟繁华 / 113

——评王充闾的散文创作

视听手记 走进打击乐

苍 耳 / 126

读莫扎特与忆乡村

耿 翔 / 130

思想空间	大地的钥词	蒋 蓝 / 164
生活场景	百衣	陈洪金 / 171
	想得开	彭国梁 / 179
记忆刻度	人之初：成长蒙太奇	谢宗玉 / 184
	刹那间的生死体验	王维旗 / 221
阅读经验	我们与他	郭小聪 / 225
	批评的衰败	吴洪森 / 244
编余琐记	编余琐记	祝 勇 / 246

在荒原上 歌唱

刘 春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四日，我失魂落魄，无所事事，觉得要对这个世界表达些什么，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么几句：

他在水面上演奏安魂曲，为瓶子里的女人
安排一生的命运——她谙熟肯德基
麦当劳，而她苦心等待的情郎
极有可能是一只猴子

几分钟后，这几句话成为一首题为《T. S. 艾略特》的诗的开头。而我在写这些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去世了好几十年的诗坛巨擘。可是，我的笔下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瓶子里的女人”几个字。那是《荒原》题记中出现的意象——“我亲眼看见大名鼎鼎的古米的西比尔被吊在一只瓶子里，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这句话与希腊神话有关，据说出自一个剧本，我没有读过。我在书店里读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美文学理论集，其中有几篇文章与《荒原》有关。作者说，《荒原》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本，各个译本有一定的差异。在对“题记”的翻译上，有人译为“西比尔被吊在瓶子里”，有的则译为“西比尔被吊在笼子里”，作者说，瓶子里怎么能够装得下人呢？（这使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左联老作家对卡夫卡的评价：《变形记》算什么呢？人怎么能够变成甲虫？不符合进化论嘛！）所以他认为该译为笼子。可是，作者又说，据考

证，“被吊在瓶子里”是正确的，因为剧本的原文是如此。我有些纳闷儿，“瓶子”还是“笼子”真有那么重要吗？某些学者在做学问时常常犯这种钻牛角尖和丢西瓜捡芝麻的蠢事，如同“红学”研究者考证曹雪芹是否患香港脚般无聊。连真理都已经变得荒诞了，我们为什么非要用新闻的眼光来审视一首虚构的诗篇？再说，神话无论如何也是浪漫主义的产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浪漫一些，甚至继续浪漫下去——既然一个人可以被吊在瓶子里，一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她的情郎又怎么不可能是一只滑稽的猴子？

我在诗中描述了艾略特的相貌。我看见过他，在某本诗集里，清瘦、眉毛浓黑，胡子没叶芝的长，但比叶芝的冷峭。他的出现有点儿不合时宜，在英美诗界，威廉·叶芝的影响如日中天，没有比叶芝更硬的胡子，不可能撑起一片天空。叶芝当然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可是，他的平淡和纯粹走到后期，却起到了毒素般的作用——如果没有庞德的提醒，这个老头儿可能“晚节不保”——当那种华美而透明的诗风席卷世界诗坛时，人类就如同患上了软骨症。（那个时候，徐志摩、戴望舒们不也正在给本已困乏之极的中国涂口红画眉毛吗？）时代需要一个比叶芝更硬朗的诗人。艾略特被推到了前台。艾略特是幸运的，他对温文尔雅的诗风的颠覆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抵抗，大多数人怀着宽容的态度和欣喜的目光接受了他的出场。言语环境的开放令人艳羡，如果把背景换为苏联或者中国，他不仅不会成为英雄，还可能被法定为“社会的寄生虫”，或者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甚至是“反革命”。胡风、穆旦、索尔尼仁琴、布罗茨基的遭遇不是明摆着吗？

必须提及庞德，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比艾略特更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他，《荒原》也许还是一堆芜杂的语言碎片，艾略特去斯德哥尔摩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好几年，甚至永远到达不了。这个兼具作家导师和经纪人身份的诗人，把一生中的大量时间花在了为朋友牵针引线上，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客厅，诗人作家彼来此往。“除草者是极为需



要的，如果缪斯的花园仍然是一个花园的话。”（庞德：《阅读ABC》）面对《荒原》，庞德担当的正是“除草者”的重任，是他将《荒原》中的杂乱多余的枝蔓清除掉，使这首旷世杰作显露出峥嵘的棱角。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首优美的钢琴曲，那么是庞德为艾略特建筑了琴房，并敦促后者进行艰苦卓绝的磨炼。后来的事实证明庞德简直就是一个百算百中的风水师，为艾略特算准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道路。艾略特也“知恩图报”，满怀感激地将《荒原》题赠给庞德，并尊称其为“最伟大的艺人”。人生难测，当艾略特写出《四个四重奏》，再一步向斯德哥尔摩迈进时，一九四五年，庞德却因为“卖国罪”被投入了大牢，随后在精神病院一关就是十二年。

与博尔赫斯一样，庞德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诗人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本身的遗憾。他发动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横亘英美诗坛半个世纪。如果没有庞德，很难想象叶芝会在晚年抛弃了华丽婉约的诗风，而逐渐行进到现代化的阵营中。庞德和艾略特为现代美国诗歌确立了新的审美原则和标准，但作为诗人的庞德与作为“卖国者”的庞德同样令人难以言说，几乎没有读者能真正读懂他。有一个晚上，我花了整整五个小时来阅读《比萨诗章》，结果我一无所获，我只看到了杂乱和泥沙俱下。他雄心勃勃地“曾试图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又犹疑不定：“不知道人性如何承受/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这就是庞德，他高贵与蒙尘的灵魂在向世界哀叹。现在，我多么想回忆起《比萨诗章》中更多的经典诗句，或者跑到地铁站，观望那一张张如花朵般潮湿的面孔来回闪烁。可是，当我提起笔，眼前却浮现出西比尔那张绝望的脸……

“《荒原》的出现是一场灾难。”（弗洛斯特）在诗风甜腻的后期浪漫派诗人眼中，“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产生。”（叶芝）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那些脆弱的只知道呆在园子里吟唱花朵的诗人，眼中露出恐惧的光芒。而艾略特没有过多的停留，他只是写出了《荒原》而已，他还没有写出一

锤定音的《四个四重奏》。他知道自己破坏了一些东西，而仅仅是破坏还不够，艺术本身在身后推动着他，他还要建立，那将是他自己的琴房。“我们将不会终止我们的探寻/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出发的地点。”（《四个四重奏》）后来的文学史家已经看到了，一九二二年，写出了《荒原》的诗人又上路了。

尽管受到了一些看似严厉的攻击，但这已是色厉内荏（叶芝和斯蒂文森的话与其说是担忧，不如说是肯定），空洞萎靡的伪浪漫主义诗歌迅速地撤退下来。那些柔软的、华丽的诗歌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撤离呢？那些整日里风花雪月的诗人何以如此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内容。我想谈另外的诗歌和诗人——《荒原》前面的《红色手推车》和《雪夜林边驻足》，艾略特对面的威廉斯和弗洛斯特。他们一直都是诗学上的同路人和对手，《红色手推车》试图通过对事物的客观描述给生活定下秩序，让一切都围绕着“力的中心”，就像田纳西州上的那个无形的“坛子”；而《荒原》则定下了另一种秩序，它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靠的是诗意的弥漫而不是聚拢。时至今日，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诗人在世界诗坛上的地位已远逊于艾略特，有的诗人虽有遗世独立的隐逸之风，却缺乏艾略特那种揭开疤痕的勇气。诗人的思想和性情决定了他的作品取向，一个内心虚弱的诗人（这里当然不是指威廉斯和弗洛斯特）不可能对时代的伤痛作出深刻洞察，即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也不会与这个时代一同去忍受、去揭示。他们需要玫瑰和美酒，需要爱却不愿意去爱人。他们就是瓶子里的人，自我封闭，再用一根细绳悬在半空中，梦想着女人的丰乳肥臀；或者“穷则独善其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时代在前进，轰隆隆的推土机在推倒旧建筑，新的工地上脚手架已架起，风雨就要来临，可怜的透明玻璃瓶，它将随波逐流到哪一个地方？

艾略特承受着疼痛。这疼痛是时代给予的，每个人都一样。不同的是有的人避开了，有的人忍受着，承担着并发出声音的永远是其中



的少数。这里面，艾略特的声音尖锐突兀而意味深长。我们重温诗人八十年前说出的话，就会发现隐含其间的惊人敏感：“欧洲的一半，至少是东欧的一半，正在走向通往混乱的道路上，因为某种神圣的疯狂而神志不清，沿着悬崖的边缘前进。”（《荒原》注释）联想到最近数十年来的东欧剧变，我们没有理由不钦佩诗人敏锐的目光：十月革命来临，世界在酝酿着大组合、大变革，美的幻象在破灭，人类在变成“空心人”。而即使“神圣”都疯狂了，诗人也没有。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艾略特一直在歌唱着，从解剖刀般尖利的揭露到宗教抚慰心灵的回归，诗人永远没有停止对“人”和“人性”的关怀。一个大学教授、白领、《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作者，即使将“诺贝尔”的因素排除在外，他仍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心怀敬意地对他唱赞歌，没有理由不给予他足够的恭维，而他又怎么会不在乎？于是，在最庄严的一刻，他恶作剧般地唱起了“情歌”——“那么，我们走吧。”（《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诗人引领着我们继续前行……

一九八七年习诗到一九九一年接触艾略特，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我接触得太晚，而相对于许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却不算太迟，但我仍然忍不住内心的沮丧——要是再早几年读到艾略特，我的诗歌学徒期将会减少好几年。我时常回想起当年那一段黄金般闪亮的日子：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充满尘灰的《美国现代诗选》，当《荒原》出现在我面前时，狭窄的图书馆变成了宽阔的广场；道路在展开，无边无际。我同时记住了赵毅衡，一个学者、优秀的美国诗歌翻译者，我对他的敬重保持到了今天，并将保持下去。我甚至爱屋及乌，购买了好几本才华不算太出众的虹影的作品集，仅仅因为她是赵毅衡的夫人。

从那一年起，我开始了有意识的诗歌写作。我记下了一个意象，并一再运用到自己的诗中，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的充满泪水的眼睛》中的“泪水”。那种爱与恨之间的哀怜，那种生命中的轮回与悖论：

我最后一次看见的充满泪水的眼睛
越过分界线这里，在死亡的梦幻王国中
金色的幻象重新出现
我看到眼睛，但看不到泪水
这是我的苦难……

可是，仅凭我那些浅薄的写作，就能够与诗人达成联系吗？不能，他写下了壮美的诗篇，而我留下的只是凌乱的字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开口闭口艾略特，还能随口说出一长串“新批评”术语，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中国艾略特”层次，可以将诗人从纸面上拉扯出来对话。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诗人的强大在于内心而不是技巧的运用；艺术的最高境界除了对美的讴歌，更有对丑的揭示。相比之下，空虚短视的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词语的奴隶而已。交流？对话？不，在艾略特面前，他们还要当八辈子学徒。

学徒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仰慕者只看到了偶像宽厚的背影，以为多进几次肯德基就能够长得和偶像一般高大。一些诗人于是迷失了道路，把诗歌风格当作披在身上的衣服，想脱就脱，想换就换。好像席慕容脱掉那身华丽的外衣，穿上一套休闲装，就能够成为普拉斯。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吗？诗歌创作与诗人的修养、气质、阅历和文化层次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从古到今，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数不胜数。而我们仍然不时地遭遇到这样的“犬”，国内某些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诗人，白天披着大师的外衣，端着大师的架子，惟妙惟肖；晚上则扮演了外科医生的角色，在他们的解剖刀下，真正的大师都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被拆散的大师还是原来的大师吗？当然，靠“解剖”大师写作能够使自己成为大师吗？值得怀疑——拙劣的“医生”们获得的往往只是大师的皮毛、脚气和狐臭。那么，是什么在背后催促着这些“大名鼎鼎”（见《荒原》题记）实则“气血两虚”的诗人们乐此不



疲地肢解和“借用”别人的诗篇呢？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艾略特满面嘲弄的表情——

世界结束了
不是嘭的巨响
而是嘘的一声

——艾略特《空心人》

不可思议的 旅程

棠 棣

地 图

—

一四五七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 Mauro）应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 V）邀请绘制世界地图，两年后完成。一四五九年，这幅重要的地图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神秘失踪。所幸毛罗本人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件副本，几经辗转，终于保留下来。将近五个半世纪后，我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Venice）目睹了这幅地图。令我失望的是，面前的这幅古地图如同纷乱的星图，令我困惑不解。

工作人员将这幅圆形地图旋转一百八十度，一幅令我熟悉的世界图景便清晰呈现。我不仅看到了日本列岛，而且清楚地找到了中国的海岸线。十五世纪，西方人开始用他们的画笔和舰艇逼近东方。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毛罗世界地图》的一条注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的史实——大约在一四二〇年左右，有一条大船或称“印度的中国式帆船”（onchodeindia）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四十天，约两千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七十天回到



上述迪布角。在注记旁边，毛罗还画了一张中国帆船的图片。据台湾大学教授凌纯声考证，葡萄牙语 oncho 一名，来自汉语“船”。那么，这艘闯入了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所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二

从中国的史料中，我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一四二〇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官方文件中记录的重大事件，首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就在第二年年初，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然而，给朱棣形成打击的，不是这场意外的火灾，而是朝中大臣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一片反对之声，要求停止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早晨，他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书，他们在这份上书中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

李时勉和邹辑的措辞十分巧妙，他们把终止航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它们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总之，是送礼的客人太多，令人不厌其烦，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显然，这份略显幽默的上书只要求结果，却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动因，那就是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让我们回到十八年前，也就是公元一四〇三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炆；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过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手里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的上台，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他上台的同时，他就已经下定了迁都北京，以及重新疏浚在元

代已经被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这两件事情的内在联系是，由于北京已成他的常驻之地，因而他每年要“将四百万石（每石合 107.4 公升）从南方各省征集的‘税粮’漕运到北方，漕运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地税收入的七分之一。”（《纵乐的困惑》，[加]卜正民著，第 40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公元一四一一至一四一五年，仅清理山东境内的河床，就动用民工十六万五千人。（《纵乐的困惑》，[加]卜正民著，第 40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同一年，朱棣动用三千文士，历时三年，编纂总字数多达三亿七千万的《永乐大典》。两年后，他派遣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气宇轩昂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为数不多的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计算郑和远航的成本。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

（《广志绎》卷一）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一四〇六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公元一四一〇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



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三

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朱棣通过四年战争推翻的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却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它标明了朱允炆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的政权合法性，只要朱允炆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那方玉玺本身就是政权。它控制着千万颗人头的命运，因而，它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多。

当我试图在史料中寻找线索时，又一张地图引起我的注意。公元

一四〇三年×月×日，也就是朱棣率领大军杀入都城南京这一天，走投无路的建文帝朱允炆下令烧毁宫殿，同时慌忙找来老皇帝朱元璋生前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最上面是一张羊皮，羊皮中裹着一幅以墨绘制的地图。图中标明乾宫旁边古井中，有一地下通道，通往长江附近的孔庙，而另外一张地图，则绘出以孔庙为起点，前往武昌的道路。显然，这是朱元璋担心孙子无力应对叔父们的挑战，而精心为他准备的逃亡之路。这并不是实测地图，而仅仅是一幅示意图。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朱元璋可以算得上半个地理学家，对江南地形的了如指掌，使他为他的孙子设计了一条最便捷的逃亡之路。据说，朱允炆在读过这张地图后，便毫不犹豫地取出铁箱里事先备好的袈裟、草鞋、僧帽、度牒、剃刀、银钱等物，削发扮作僧人，经由孔庙，逃出京城。

这幅地图仅存于一些历史秘录中，除了朱允炆本人，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它的真实面目。那么，它是否存在？这幅简单的示意图，是否能够挽救这位逊位皇帝的生命？

真实再现：道路隐藏在草丛下面，暗示着行者的存在。沿着山野里的小路追踪，我看见山间的亭子里立着一个人。是郑和，正向远方眺望。他的目光迷失在远山弯曲的褶皱里。他是在滇池飘来的水汽中怀念着大海，还是想象着那个逃亡者匆促的脚步？我从他背后慢慢向他靠近。很久，他回过身，问我：“周闻，都安排好了吗？”

我答：“所有的线索都在核实。估计不久就有消息。”

郑和又问：“你认为他会在云南吗？”

我答：“我们尽力吧。”

“如果是你，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我笑了：“要么近在眼前，要么远在天边。”我的回答里带着几分玩笑的成分。我知道，在找到失踪者之前，任何推断都是不准确的。

郑和望着我，沉吟半晌，然后，他走到亭子里。我看见石案上摆着笔墨，微风拂动着洁白的宣纸，我读到如下文字：

